

中国古代报纸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唐 春 生 吴 寰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中国古代报纸历经汉唐的萌芽,至宋逐渐发展成型,到明清进一步完善。学界对中国古代报纸的研究已百年有余,通过梳理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发现关于中国古代报纸的研究主要涵盖了起源、名称、性质与特征,以及管理制度与管理机构等相关问题,其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缺憾并存。展望中国古代报纸的研究,在论题的选择、研究方法以及文献资料的运用诸方面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关键词:中国古代报纸;学术史;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2)01-0104-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20110

报纸作为中国古代一种主要的信息发布载体之一,其记录虽难以窥见其时各方情况的全貌,但仍可以小见大地一窥历代些许沉浮。越来越多学者投身于古代报纸这一领域的研究,众多的学术论著得以刊布。就目前的成果看,主要涉及到古代报纸的起源、性质、名称、发布与管理等方方面面,但对于影响中国古代报纸研究进程的关键性议题的争论依旧存在。本文拟对学界关于古代报纸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梳理,并予以评述,希望建立起解决中国古代报纸研究窘境的问题意识,探讨其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关于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

对于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问题,学界主要有四种说法,即“周朝说”“战国说”“汉朝说”和“唐朝说”。其中,“战国说”的影响较弱,而以“唐朝说”最为新闻史学者所普遍接受。

(一)周朝说

1896年,梁启超将《诗经》《春秋》与后世的《民报》相类比,其认为:“古者太师陈师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轺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1]这是关于中国古代报纸周朝起源说的滥觞。倪延年也认为《春秋》中的采风记事极具新闻属性,指出“中国古代报刊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春秋》,似乎也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2]10}。20世纪20年代末前后,日本学者杉村广太郎在其所著的《新闻概论》中认为:“‘京报’是官报的一类,从周朝就有,一直持续到清朝的

收稿日期:2021-11-21

作者简介:唐春生(1964—),男,湖南武冈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吴 寰(1993—),女,重庆奉节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基金项目:重庆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宋代邸报研究”(YKC21001);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化共识与政治盟约:汉儒与汉帝国稳定机制的构筑”(2021NDYB154)。

灭亡。”^{[3]25}

(二)汉朝说

在《中国报学史》中,戈公振依据《西汉会要》对“邸”这一机构“通奏报,待朝宿”功能的描述,提出“汉有邸报乎”^{[4]35}?虽以疑问句出之,实为肯定汉代即有邸报。此后,大批国内外学者均采纳戈氏的汉朝说,诸如中国大陆学者黄天鹏、吴晓芝和中国台湾学者曾虚白、赖光临,以及日本学者楚人冠等。方汉奇在早期也认同这一说法,指出“远在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初年,中国就出现了这种被称为邸报的宫廷报纸”^[5]。

20世纪末21世纪初,学者张涛据出土汉简撰写了《西汉末年已经有了报纸吗》,文章肯定西汉末年已经有报纸的观点^[6]。其在《论西汉“木简报”》中又提出“木简报”这一概念,并对其传播作了详细考述^[7]。紧接着,张涛更是明确提出“汉代存在着正式的官方的信息发布形式——‘府报’”^[8]。从肯定汉朝说,到提出作为其佐证的“木简报”“府报”,这些耳目一新的说法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陈力丹对此予以肯定,并撰文《发现“府报”——我国古代报纸的历史前推800年》。^[9]

当然,对汉朝说的否定声音也一直存在。黄卓明指出:“目前还未能在汉代史料中发现有关‘邸报’的记载。”“甚至在汉以后的三国、晋、南北朝、隋等朝代,也还未能在古籍中,发现超出单纯‘官文书’的原始形态报纸的有关记载。”^{[10]17}姚福申通过对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简牍的考证,认为“汉代确实有向群众发布新闻的简牍,但它的发布形式和传递途径完全不同于前人所推测的‘邸报’”^[11]。故而否定汉代邸报说。黄春平赞同姚福申之说,并就先前张涛、陈力丹支持的“府报”说提出不一样的观点,认为“单从出土的简牍来看,汉代确实有着一定的信息发布媒介,存在着一定的发布程序,有着特有的信息发布方式。但这种媒介不是‘府报’,而是带有告示性质的布告。”^[12]随后,黄春平对汉邸“朝宿之所”的职能以及两汉严厉的传播控制进行了考察,接连发文对汉朝说进一步提出质疑^[13]。

(三)唐朝说

唐朝说是目前最受学界认可的一种说法。方汉奇早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就提出“邸报大约起始于唐朝”^[14]。尔后,在其发表的相关文章及主编的新闻史著作中也仍坚持唐朝说。姚福申认为“邸报产生于晚唐。然而就唐代邸报而言,既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传播也并不普遍”^[15]。黄卓明通过梳理相关历史文献,对唐代进奏院状进行了详细考察,得出结论:“中国的原始形态报纸应始见于唐代,而且很有可能是在‘盛唐’的历史条件下,创始于开元年间。”^{[10]38}倪延年也认为报纸的出现“至迟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55)”^{[2]43}。王洪祥主编的《中国新闻史》中同样持相似看法:“就在这开元盛世时期,我国出现了最早的手写报纸——报状。”^[16]中国台湾学者朱传誉在《唐代报纸研究》一文中将唐人的《东观奏记》和《前定录》中所提到的报状认为是邸报^[17],可认为其是支持唐朝说的。

与上述学者所持“唐朝说”观点相左,张国刚认为唐代进奏院状以及孙樵明确提及的“开元杂报”都并非邸报,甚至“邸报”一词在唐代都还尚未成形^[18]。江向东观点与张氏类似,虽认同邸报是古代报纸,但仍就唐代进奏院状以及“开元杂报”的性质、雕版“开元杂报”的虚假性、“状报”一词的使用范围等作出考证,质疑“唐朝说”的成立^[19]。

总体来看,支持周朝说观点的学者并不多,汉朝说也尚未找到更多的文献记载来佐证,唐朝说为目前学界较普遍接受。关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问题的探讨恐怕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逐渐有学者尝试提出解决这一争议问题的路径。廖基添的《邸报是古代报纸吗?——中国古代报纸发展线索再梳理》,认为争议的焦点在于学界对中国古代报纸的概念没有清晰的认同,作者借鉴西方报纸起源的研究成果,对“古代报纸”的核心特征进行了界定,试图对中国古代报纸的发展作出新的解释。他认为,中国古代报纸与官方邸报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只有在民间出售的那些小报才属于古代报纸的范畴,所以中国古代报纸应当以宋代小报为源^[20]。许鑫的《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产生根源与破解路径》,

也认为“争议的产生原因,除了缺少实物证据,还有研究者对古代报纸相关概念使用的模糊及评判标准的多元”,主张用“有组织的新闻传播活动”或“前报纸形态”等概念来取代“古代报纸”的说法,这样中国古代报刊史的研究才有可能突破“汉唐—邸报”的学术路径,将汉唐以前的报纸类似物纳入研究范畴^[21]。笔者认为,姑且不论这些观点是否妥当,至少在切实推进学术进展上是可取的。

二、关于中国古代报纸的名称、性质与特征

(一) 报纸名称问题

学术界认为,历史上曾作为中国古代报纸名称的主要有进奏院状、状报、报状、邸吏报、上都留后报、杂报、邸报、邸抄、朝报、条报、阁抄、塘报、京报等十余种。从文献记载来看,历代对于当朝报纸的称呼不尽相同,甚至同一时代对同一种报纸都会有不同的叫法。其中“邸报”这一说法的出现频次最多、沿用时间最久,因而学者们通常对古代的各类报纸均统称或概称为“邸报”。“一部中国古代报纸史基本上就是一部‘邸报史’。”^{[10]8}为厘清研究线索且有效推进相关研究,有学者开始探讨中国古代报纸的名称问题。

姚福申对历代朝报、进奏院状、邸报、京报的变迁作了详细的考察,认为“朝报”“进奏院状”“邸报”“京报”是中国古代封建官报的四种基本名称,可以概括从唐初到清末各种类型的古代官报。古代官报的各种概念,有时名同而实异,有时名异而实同。不同历史时期官报的名称须具体分析,才能判定其实际性质^[22]。郑传斌在谈到宋代邸报时指出:“宋代邸报是进奏院状报的一个分支性官报。宋代进奏院状报,又称进奏院报状、进奏院报、进奏院递报、进奏院官报。”^[23]廖基添认为历史上的“朝报”至晚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已出现,并详细罗列了“朝报”经历的历代变迁。从宋到明清,“朝报”所指代的报纸种类从进奏院状到民间小报以及官方邸报都有^[24]。申忠玲对唐代进奏院状报的各种称呼作了梳理,认为进奏院状报是其时常见的一种称谓,状报是进奏院状报的简称,报又是状报的简称。“因唐代进奏官又称‘邸吏’,故进奏院状报有时也称‘邸吏状’。又因唐代进奏院的前身为上都留后,故进奏院状报又称上都留后状。”^[25]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报纸的名称要想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实际上较为困难。学界用“邸报”这一称呼来以偏概全中国古代报纸,一为无奈之举,二乃当前比较习惯化的选择。但“邸报”不是某一种报纸的专有名词,这一点毋庸置疑,且得到学界的公认。

(二) 报纸的性质与特征问题

学界对这一问题大多基于特定对象,也就是说,从某一朝代或是某一种报纸入手进行考察。

1. 唐代报状和进奏院状报

黄卓明认为,“唐代的‘报状’,应是具有中央政府公报性质的原始形态报纸。”^{[10]25}倪延年采纳了这一观点,认同这种“报状”是“中央政府公报”,并进一步指出:“在唐代的确存在一种名叫‘报状’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是由唐朝中央政府(朝廷)根据皇帝旨令,定期或不定期编发的,主要内容是对官吏的任命和免职。”^{[2]47-48}同时,黄卓明还认为“报状”和“进奏院状报”是两种不同的古代报纸,指出“进奏院状”是“以‘报状’为根据而发展起来的”^{[10]28}。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认为这种雏形的官报,并没有固定的名称,有的称为“进奏院状”,有的称为“报状”^{[26]6},也就是说,“报状”和“进奏院状”是同一事物。

随着两份敦煌进奏院状的发现,学者们对唐代进奏院状报做了新的考证。李彬探讨了两份敦煌进奏院状的文字内容,得出一个介于张国刚“官文书”论和方汉奇“古代报纸”论中间的结论,认为“唐代进

奏院的状报在新闻传播史上的准确定位应该是新闻信”^[27]。

2. 宋代邸报与小报

中国台湾学者朱传誉1967年出版《宋代新闻史》，认为邸报属于宋代的中央政府官报^[28]。这一观点成了很长一段时间乃至当前学界的共识。自本世纪初以来，不断有学者从各角度重新审视邸报的性质。郑传斌指出：“宋代邸报具有双重性特征，既有进奏院状报的官报性质，又具宋代小报的一些民间报纸的性质。”^[23]徐枫认为邸报就是宋代的官报，进奏院状报、状报都是宋代官报^[29]。游彪则提出邸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邸报是指中央通过邮递下发到各地的所有文书，其涵盖的范围非常宽泛；狭义的邸报则是进奏院编辑发行的‘定本’报状，二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30]但也有人坚信宋代邸报与进奏院状报就是同一事物。如马海峰就提出宋代的进奏院报又称朝报、邸报，是由进奏院发布的，认为“宋代的进奏院报与邸报其实是同一事物，只是称呼有所不同”^[31]。李亚菲在《宋代邸报研究》中也持类似观点^[32]。

周军玲指出宋代小报是我国新闻史上最早出现的带有一定民间性质的报纸^[33]。吴世文认为宋代“小报的存在实际上是信息透明和信息公开的问题”^[34]。张秋玲通过研究宋代“小报”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宋代“小报”的内容和特点，得出“无论是从宋代小报的内容本身还是作为出版物的出版自由的视角来看，宋代市民的言论自由，虽然政府层面有严格的政策限制，但实际上，宋代市民得到了比政府给予更加广泛的言论自由”^[35]的结论。彭玲在认可小报是中国古代最早民间报纸的前提下，认为“小报诞生于当时的封建官方报纸邸报，无论从内容还是时效性方面都比邸报更具有新闻性”^[36]。

3. 明清京报

黄卓明认为京报创办于明末，且由民间经营，“是中国古代报纸由原始形态向近代形态的一个过渡，标志着中国古代报纸有了更大的发展”^{[10]107}。而姚福申对京报起源于明代一说存疑。一是因为明代史料少见“京报”一词，二是现存的京报原件都是清道光年间以后的。同时，姚福申认为：“‘京报’并不是商品性质的民营京报，而是地地道道的官办邸报。”“京报转为民营应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事。”^[37]方汉奇赞同京报即邸报，并认为“发自中枢的官报只有邸报一家”，京报“不可能是性质不同的另类报纸”^{[26]21-22}。何海巍、孔正毅认为作为一种报纸形态，明代的“京报”至迟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就已存在，并提出其具有政府官报性质和民间私报性质的新观点^[38]。倪延年《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有专章介绍了清代京报，指出京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种拥有专名的并且以‘报’相称、连续发行、广泛传播并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信息传播媒体；是中国古代传统型民间报纸发展的顶峰”^{[2]233}。廖欣的《清代京报研究》认为京报的性质在清朝经历了从官报到民报的蜕变^[39]。

以上学人所论，由唐宋至明清，均有所论，然鲜少涉及元代。针对元代有无邸报，学界莫衷一是。戈公振先生《中国报学史》认为元代是存在着邸报的^{[4]45}。但其仅征引了周密《癸辛杂识续集》里的一段话，似为孤证。随后，方汉奇先生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元代的封建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中断了两宋时期确立的邸报发布制度。在元代，不存在由中枢部门统一发布的封建政府官报”^[40]。黄卓明也认为“原始形态报纸，在元初一度残存之后就中断了”^{[10]74}。姚福申根据蒙古文字的诞生过程和明代文献也推测元代不存在邸报^[41]。如此一来，中国新闻史学界很长一段时间都倾向于元代无邸报说。对元代邸报的其他问题更无从考证。近年来，孔正毅发表相关文章认为元代极有可能存在“邸报”，只是元代“邸报”不像其他各朝“邸报”那么发达^[42]。李漫则就孔氏说法发文商榷，提出不同的结论^[43]。所以，关于元代有无邸报这一问题的研究，近年来总体情况变化不大。

三、关于中国古代报纸的发行对象与管理

对于中国古代报纸的传播内容，很多论文都有论及，学界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即：皇帝诏旨及言行，

臣僚奏章,官吏任免及军事情报等。此处主要从读者、管理机构及相关制度三方面加以介绍。

(一) 邸报的读者

尹韵公在考察明代邸报传抄量的同时,认为明代报纸的读者群包括京城及外地的官吏阶层和关心时政的知识分子阶层,其中官吏阶层仍是主要读者^[44]。周桂林也持相似看法,但对读者群的划分更为细致,认为“明代邸报之受众似应包括官、民两部分人,官指任上官、致仕官、乞养官、谪戍官、待罪官等”^[45]。游彪着重考察了宋代各级官吏作为邸报的主要读者与邸报之间的重要关系^{[46]97-103}。魏海岩对能接触到宋代邸报的读者进行了总结,认为读者主要分为以在职官员为代表的“基本型读者”和与官员有关系人员的“扩散型读者”的两大类^[47]。总体来说,历代报纸的读者都是以各级官吏以及其亲友为主,下层百姓是很难接触到官报形式的古代报纸的。宋时出现的小报以及后来的京报等民间报纸,才使得百姓有机会阅读到古代报纸。

(二) 进奏院

李彬详细考证了唐代进奏院的源起、地理位置分布、职能。指出唐代进奏院源于唐朝初年的朝集使,起初是作为朝集使的在京居所被建成的,其后作为信息传播机构的发展与唐代各藩镇势力息息相关^[48]。孟萌萌认为,唐宋时期的进奏院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机构,其专业化进程对报纸的大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49]。秦阳主要研究了唐代进奏院的选址问题,并对其予以总结,认为其“既要满足藩镇的利益诉求又不能触动中央的底线,还要靠近当时的商业发展中心以方便其职能的行使,这些特点促使唐代进奏院在京师长安的选址最终形成了靠近大明宫、皇城和东市的格局”^[50]。杨红则对宋代进奏院的产生、管理者、工作内容做了考察,虽然不认为宋代进奏院是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机构,但承认其“的确是宋代收集、整理和发布传播新闻的官方机构”^[51]。田海宾的硕士论文主要分析了宋代进奏院的发展演变、运作过程以及进奏院与宋廷朝政的关系^[52]。

(三) 管理制度

在管理制度方面,游彪详细论述了宋代对邸报禁载的内容,认为“于朝廷而言,邸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加强对邸报的严格控制便成为完善集权体制的必要环节”^{[46]97}。李四明指出宋代的新闻造假活动屡禁不止,宋代统治者不得不对新闻采取了新闻管制^[53]。魏海岩认为,“宋代朝廷可以通过控制进奏院中各种信息媒介传播的内容、时机、方式等,实现舆论引导”^[54]。邓绍根对定本制度进行考察,认为宋代“在新闻发布机制上颇有创意地设计出了一套新闻的采集、编辑、整理、审定和发行制度,规制和管理着宋代新闻事业的向前发展”^[55]。

近几年,还出现了一些以宋代新闻管理制度及发布机构——都进奏院为主题的硕士论文。李亚菲在其《宋代邸报研究》中详细介绍了宋代邸报的生产过程、流通机制和管理体系^[32]。魏莹莹的《宋代进奏院官吏研究》,对宋时的信息传播管理评论道:“朝廷制定严密的措施管控,力图使进奏院官吏举手投足之间都在制度的藩篱之中成为朝廷的传声筒。”^[56]侯明扬的《宋代社会的新闻控制研究》^[57]、孙奥的《宋代信息传播禁令研究》^[58],都不限于古代报纸的范畴,而从信息管控的宏观角度对宋代邸报等舆论工具的严格管理做了考察。

四、中国古代报纸研究的特征和反思

(一) 学界研究中国古代报纸的特点

1. 以新闻传播学研究为主,其他学科为辅。

单就“中国古代报纸”这一事物的舆论载体属性,相关议题划归为新闻传播学似乎毫无悬念。所以,对古代报纸相关问题研究的主力军一直是新闻传播学的学者们,所选论题也大多是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予以探讨。早期的戈公振、方汉奇、朱传誉等,以及后起之秀尹韵公、孔正毅、李彬、李漫,这些都是

著名的新闻学历史研究者。纵观既有的研究成果,从带有新闻传播学符号标签的传播者、受众、传播过程、传播方式等视角进行论述考证者居多。而相较于历史学与文学视域的研究,其热度不得不承认位居劣势。对于传统历史学和文学来说,“古代报纸”算不上主流议题,学界易忽视之。

2. 论文成果居多,专著较少。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20年12月,知网数据库上关于中国古代报纸相关问题的论文有150篇左右,其中包括少量几篇硕士论文。这些论文基本上是选取中国古代报纸的某一阶段或某一特有问题进行考察。论文成果较多,但专著方面仍略显薄弱。笔者视域所限,主要见有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黄卓明《古代报纸探源》、倪延年《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朱传誉《宋代新闻史》四部专论中国古代报纸的著作,且几乎都是通史类,仅《宋代新闻史》专论赵宋一朝。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则多散见于各类新闻学著作中的某些章节。

3. 争议性问题尚未解决。

对中国古代报纸的研究,严格来说,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时至今日,已有百余年历史。就时间维度来看,这本应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但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争议与矛盾一直存在。针对中国古代报纸起源、性质、名称、元代究竟有无邸报等问题,学者们各执其说。在确凿的史实证据被发现前,学界对一些问题的论述很难避免空洞陈词、语焉不详。

(二) 对研究现状的反思

其一,学术研究应该持有更为客观和理性的思维方式。纵观研究现状,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及其相关存在等问题,更多的是在打时间上的拉锯战。就世界范围看,部分中国学者试图论定中国古代报纸出现的时间早于西方,以突显中华泱泱大国的历史沉淀。但历史的真实性是在不断的证伪和证实过程中凸现出来的,“世界最早”这样的说法不可轻易论定。面对国内外呼声甚高的“汉朝说”,黄卓明先生认为若是缺少“史料所验证,就宁愿舍弃这份光荣”^{[10][12]}。笔者以为这是作为一代学者的责任自觉。

其二,应将中国古代报纸的研究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中予以观照。历史从来都是连续的一个整体,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与专业化才不断细化与分割。研究历史是要从纷繁复杂的具体事物中提炼出具有共性的本质认识。通过对一个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时期的展开剖析,认识历史发展的主体脉络。单项、线性地看待问题不可取,新闻史的研究亦是如此,要想有新的突破,“微观切入,宏观叙事”势在必行。也就是说,研究的问题可以是某一个小点,但总结的成果则当越过微象,予以宏观上的提炼。研究某一朝的新闻史或者说报纸史,切不可将眼光只瞄准当时当地,而应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考虑前因后果,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将整个中国古代报纸的发展串联起来。如此,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古代报纸的话语体系才能更具说服力。

其三,任何研究都应以“问题”为导向,“理论”为根基。有了“问题意识”,对相应领域的研究就会沿着这一中心去组织架构,不断延伸出新的思考,发展出以此为中心的新问题。这样的研究才具有衍生力与洞察力。如果问题的内在逻辑能通过一次次你争我辩,甚至是经历一代代学者的刨根问底,其本来面目就会逐渐被探索出来。所以,能提出有效的问题十分关键。就如戈公振关于中国古代报纸问题的一系列说法,如今学者们已然有了不少新的观点,但这依然不影响其《中国报学史》成为中国新闻史的开山之作。原因便是戈氏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充分运用了他所知晓的理论工具与掌握的材料,用他所思考到的问题归类,将那个时代所亟需的对新闻史的回答完整表述出来。所以,无论对问题的回答准确与否,戈公振为后世学者对新的学术范式进行探索打下了基础。但问题提出之后,没有扎实的理论,也很难言之有物。研究者具备了充足的理论素养,才能使研究成果更具思想性,价值取向更为高远。试想,若是连报纸的核心要素都不清楚,对官方文书与报纸的区别论证意义何在?所以,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加以好的问题引导,才能有效规避研究成果的大话空话以及重复前人工作的学术风气。

藉此,笔者就中国古代报纸的未来研究,不揣浅陋,尝试提出几点个人思考:

其一,论题的选择。既往研究总是尝试建构出一条学人都能认可的标准,为此进行了很多重复性的劳动。诸如中国古代报纸性质究竟是官方文书还是原始形态的报纸这类问题,从研究开始就一直困扰着学者,直到今天这一问题仍存争议。事实上,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对于这类问题的回答要么是跟风重复前辈学者的观点,要么就是缺少证据而想当然地提出一些博眼球的论断。我们如若一直囿于此类不能论定的结论,其他方面的研究就很难有所推进。所以,在新的实证材料发现前,类似于此的论题可适当暂缓讨论。

历史上,中国古代报纸因受严苛管制,难以准确地反映社会真实的情况,但从已有的研究中仍然可以看出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多方面的内容。单从其所载内容看,与现代报纸已有了很多相似之处。现代报纸的功能性作用反推到古代报纸也是部分成立的。所以从社会学视域来看,古代报纸与舆论传播的关系,或许是今后可以着力的领域。中国古代报纸,尤其是明清以后的报纸,很有可能记载了帝制中国与外国的交往。例如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大事,明朝的报纸很有可能对其有过记载。如此,中国古代报纸与外交就是另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时代性新议题了。钟鸣旦于2020发表的《18世纪进入全球公共领域的中国〈邸报〉》^[59],发现了中国古代的报纸与外国的宗教亦有联系,或可启发我们的思路。

还有,此前的研究大多着力于探讨中国古代报纸本身以及相关的管理机构,却忽视了处在报纸传抄环节上的人员问题。负责传抄这些报纸的人员,他们的出身、对传抄内容的选择、朝廷对这些人员的管理等等问题,这些对于中国古代报纸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已有学者注意到了以报纸为题材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学者甚至专门统计了带有邸报字眼的邸报诗。明清时期的小说、戏曲也深受当时报纸内容的影响。所以,中国古代报纸与文学的关系或许是又一个可以深耕的领域。

其二,研究方法的运用。对中国古代报纸的研究一开始就是从新闻学和史学角度出发的。多年来,考察分析的角度一直比较单一,不是纯历史文献学的史料探索,就是对新闻学传播主体、传播媒介、受众、传播效果进行分析,且一直呈现出由新闻传播学界主导的局面,文学加盟这一研究领域,也是最近十来年才开始的。因为中国古代报纸的内容涉及面广,所以对其进行的考察就不应只是某一两个学科。中国古代报纸研究虽立足于新闻传播学界,其内部逻辑始终联系着众多学科,社会学、政治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应当综合运用,才能切实解决中国古代报纸的诸多问题。各学科交叉与结合、携手攻关是中国古代报纸未来研究的大势所趋。

其三,文献资料的占有。造成中国古代报纸研究争议颇多、重复论断的现象,史料是一个关键性因素。一方面,现存的关于中国古代报纸的史料并不多,实物原件更是少之又少;另一方面,部分史料来源于官方史书记载,但也还有许多藏于笔记、文学作品当中,尤其是明清以后的文学作品。这一部分资料收集不易,耗时费力。这不仅是实证研究的桎梏,也限制了新议题的提出。在中国古代报纸的实际研究中,学者们对史料的运用十分有限,大多囿于《西汉会要》《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朝野类要》等相关纸质文献史料。未来的研究除了对传统史料的充分利用与再三考察外,尤应注意利用国内外诸如石刻、出土实物如两份现存的敦煌进奏院状、方志、档案等材料,这或许是拓展中国古代报纸研究的新路径。

[参 考 文 献]

- [1] 梁启超.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N]. 时务报(第1册),1896(8).
- [2] 倪延年. 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 [3] 杉村广太郎. 新闻概论[M]. 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0.
- [4]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5] 方汉奇. 谈邸报[J]. 新闻业务, 1956(7).
- [6] 张涛. 西汉末年已经有了报纸吗[N]. 中国教育报, 1998-10-20.
- [7] 张涛. 论西汉“木简报”[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1(2).
- [8] 张涛. “府报”探源[M]//方汉奇主编. 新闻春秋.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3.
- [9] 陈力丹. 发现“府报”——我国古代报纸的历史前推 800 年[J]. 当代传播, 2004(1).
- [10] 黄卓明. 古代报纸探源[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3.
- [11] 姚福申. 学海泛舟二十年——对新闻学与编辑学的探索[M]. 中国香港: 香港语丝出版社, 2001.
- [12] 黄春平. 从出土简牍看汉帝国中央的信息发布——兼评张涛先生的“府报”说[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6(4).
- [13] 黄春平. 汉代邸报问题辨析——兼论戈公振的“邸报”说[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9(4).
- [14] 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1.
- [15] 姚福申. 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J]. 新闻研究资料, 1981(4).
- [16] 王洪祥主编. 中国新闻史[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
- [17] 朱传誉. 唐代报纸研究[M]//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 中国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8.
- [18] 张国刚. 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论“邸报并非古代报纸”[J]. 学术月刊, 1986(7).
- [19] 江向东. 对中国古代报纸产生于唐代之说的质疑[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2).
- [20] 廖基添. 邸报是古代报纸吗? ——中国古代报纸发展线索再梳理[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0(1).
- [21] 许鑫. 中国古代报纸起源争议的产生根源与破解路径[J]. 全球传媒学刊, 2020(2).
- [22] 姚福申. 中国古代官报名实考(续)[J]. 新闻研究资料, 1986(1).
- [23] 郑传斌. 论宋代邸报的双重性特征[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6).
- [24] 廖基添. “朝报”一词的源流与演变[J]. 国际新闻界, 2009(7).
- [25] 申忠玲. 唐代进奏院状报考论[J]. 黑龙江史志, 2010(24).
- [26] 方汉奇主编. 中国新闻传播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27] 李彬. 新闻信: 唐代进奏院状报新解[J]. 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1998(3).
- [28] 朱传誉. 宋代新闻史[M]. 中国台北: 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 1967.
- [29] 徐枫. 论宋代邸报的性质及编辑内容的嬗变[J]. 西北师大学报, 2002(2).
- [30] 游彪. 宋朝的邸报与时政[J]. 中州学刊, 2004(6).
- [31] 马海峰. 简论宋代进奏院报与邸报的关系[J].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6).
- [32] 李亚菲. 宋代邸报研究[D]. 硕士论文, 安徽大学, 2013.
- [33] 周军玲. 宋朝的“小报”[J]. 新闻爱好者, 2007(5).
- [34] 吴世文. 亚文化理论视域下的宋代小报研究[J]. 东南传播, 2008(6).
- [35] 张秋玲. 宋代小报折射市民的言论自由程度略谈[J]. 兰台世界, 2014(18).
- [36] 彭玲. 从采编内容和流程看宋代小报的“新媒体”特征[J]. 传媒论坛, 2019(18).
- [37] 姚福申. 关于明代京报的辨析[J]. 新闻大学, 1984(1).
- [38] 何海巍, 孔正毅. 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J].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4).
- [39] 廖欣. 清代京报研究[D]. 硕士论文, 安徽大学, 2013.
- [40]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 [41] 姚福申. 关于元代“邸报”的考证[J]. 新闻大学, 1986(12).
- [42] 孔正毅. 元代“邸报”新证[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0(1).
- [43] 李漫. 元代邸报“新证”考辨——与孔正毅教授商榷[J]. 国际新闻界, 2010(6).
- [44] 尹韵公. 论明代邸报的传递、发行和印刷[J]. 新闻研究资料, 1989(4).
- [45] 周桂林. 论明代之邸报[J]. 中州学刊, 1994(4).
- [46] 游彪. 宋代邸报的“禁区”及其官员与邸报之关系[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5(4).
- [47] 魏海岩. 宋代邸报读者特点及其影响[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8(5).
- [48] 李彬. 唐代进奏院述略[J]. 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 1998(1).

- [49] 孟萌萌. 略论唐宋进奏院信息传播体系的专业化发展进程[J]. 东南传播, 2015(4).
- [50] 秦阳. 从唐代进奏院的职能角度分析其选址问题[J]. 安康学院学报, 2016(3).
- [51] 杨红. 宋代新闻机构的设置与功能[J]. 新闻出版交流, 2000(3).
- [52] 田海宾. 宋代进奏院研究[D]. 硕士论文, 河北大学, 2014.
- [53] 李四明. “邸报制度”与宋代新闻管制[J]. 新闻爱好者, 2009(8).
- [54] 魏海岩. 北宋政府时政舆论管理研究[J]. 中原文化研究, 2019(3).
- [55] 邓绍根. 规制与管理: 宋代官方新闻发布机制[J]. 人民论坛, 2019(29).
- [56] 魏莹莹. 宋代进奏院官吏研究[D]. 硕士论文, 河南大学, 2017.
- [57] 侯明扬. 宋代社会的新闻控制研究[D]. 硕士论文, 内蒙古大学, 2012.
- [58] 孙奥. 宋代信息传播禁令研究[D]. 硕士论文, 四川师范大学, 2014.
- [59] 钟鸣旦. 18 世纪进入全球公共领域的中国《邸报》[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5).

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Ancient Newspaper

Tang Chunsheng Wu Hu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Chinese ancient newspaper experienced the germination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gradually developed and formed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further improv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owadays, the press and historiography circles have studied Chinese ancient newspapers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By combing the academic research result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ancient newspaper mainly covers the origin, nam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nd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coexist.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ancient newspaper can be carried out from three aspects: the selection of topics, the applic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use of literature.

Keywords: Chinese ancient newspaper; academic history; review; prospect

[责任编辑: 刘力]